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古今
論衡

22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古今論衡

22



主編
陳熙遠

編輯委員
李建民 李宗焜 陳維鈞

編輯助理
黎瑞春 陳淑梅 陳靜芬 謝仁晏

古今

論衡

【半年刊】

第二十二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編輯小組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ISSN 1561-0594

中華民國一〇〇年六月出版

定 價 新臺幣 180 元

翻印須徵得本刊同意

美術構成：黎瑞春

封面設計：魏吉玉

印 刷 者：惠文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商：四分溪書坊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本刊已加入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CEPS 思博網——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聯合百科電子資料庫——PDF 全文檢索定位系統」

目錄

新學術之路

- 3 羅 丰 西出陽關——向達與西北史地考察團

學術與思潮

- 33 黃進興 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
- 61 鐘月岑 科學、生物政治與社會網脈：近代中國優生學與比較研究取徑之反省

文獻輯存

- 97 王炳華 「土垠」為漢「居廬訾倉」故址說
- 125 丁瑞茂 史語所藏黃文弼寄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文物
- 139 楊正顯 王陽明詩文拾遺
- 175 編後語

目錄

新學術之路

- 3 羅 丰 西出陽關——向達與西北史地考察團

學術與思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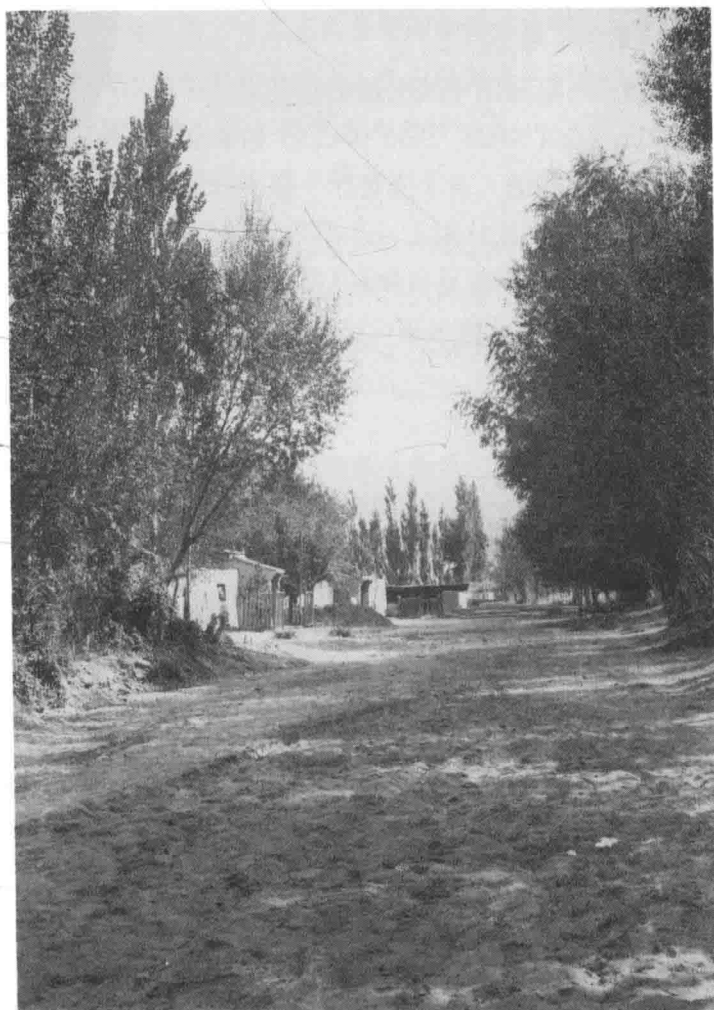
- 33 黃進興 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
- 61 鐘月岑 科學、生物政治與社會網脈：近代中國優生學與比較研究取徑之反省

文獻輯存

- 97 王炳華 「土垠」為漢「居廬訾倉」故址說
- 125 丁瑞茂 史語所藏黃文弼寄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文物
- 139 楊正顯 王陽明詩文拾遺
- 175 編後語

西出陽關

向達與西北史地考察團



敦煌千佛洞上寺（雷音寺）與中寺（皇慶寺）外觀（1942.6-9，石璋如、勞幹在敦煌莫高窟調查拍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羅 丰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22 期 2011.06

引言

在現代學者中，名字能與自己的著作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向達（1900-1966）和《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要算一個代表。他沒有華麗的筆調，卻有著持續的影響，贏得廣大範圍讀者長期稱頌的，是他淵博的學識、精湛的研究。由於諸多的因素，向達再沒有能寫出超過這部著作的作品，或許對一個偉大學者來說這已經足夠了。

四〇年代初的向達，已是治中西交通史的名家了。但熟讀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的他，並不滿足作一個純粹的書齋歷史學家。向達自告奮勇前往西北，沿著河西走廊進行考察。西北考察是向達終身引以為自豪的大事，直到多年以後仍與人津津樂道，自稱「萬里獨行俠」，用於紀念這次考察。（圖一）^①



圖一：向達（作者提供）

一、向達的名義

抗戰正酣的一九四二年，「開發大西北」、「到大西北去」，成為全社會響亮而誘人的口號。官員、藝術家、作家、記者各色人等紛湧而至，以旅行西北為時尚。象牙塔中的學者們也不甘寂寞，醞釀成立中央西北史地考察團，配合政府國策。夏鼐在以後替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起草的文件中申述理由：

甘肅高原，史前故迹，冠越各省。河西走廊，尤為古代國際重要交通路線，所經亦為西北國防重地。漢唐時代，在此經營，不遺餘力，其遺迹至今歷歷可見。今日開發西北之聲，甚囂塵上，然不具知古人之措施，何以能得一時之成效？敝所有鑒於此，故於去年與中國地理研究所合作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②

向達從一九四二年九月開始至一九四四年十月結束，風塵僕僕地參加了中央研究院等單位組織的西北考察活動。至於這兩次活動分別以什麼名義參加，以往介紹向達

① 周清澍曾回憶向達最為得意的是他四〇年代的西北考察活動，曾自稱「萬里獨行俠」。參見周清澍，〈回憶向覺明師〉，收入沙知編，《向達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頁210。

② 此件原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向內政部、教育部申請探掘甘肅古物執照之公文草稿，文稿並無具名及日期，只是字跡為夏鼐所書，此事亦為夏鼐所辦理，時間大約在一九四三年七月。文中「故於去年與」的「與」字前補加「參加」二字。

的文章卻無清晰的表達，其中包括曾經追隨向達進行第二次考察的閻文儒等撰寫的〈向達先生小傳〉也僅稱：

受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約，先生于一九四一年赴河西入敦煌，考察莫高窟……一九四三年先生任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組長（夏鼐先生任副組長，文儒任組員），再次赴河西敦煌。^③

張廣達亦稱：

1942年春，在當時開發大西北的呼聲中，重慶中央研究院曾組織包括地理等學科的西北史地考察團。考察團的歷史考古組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館、北京大學聯合組成，向先生代表北大，並出任組長，副組長為稍後去西北的夏鼐先生，組員有閻文儒先生。先生因此而得以在1942年9月至1943年7月及1944年兩次到河西走廊及敦煌。^④

類似的表述難免使人產生一些誤會，後來的學者如榮新江在評述向達敦煌學貢獻時，用了相當的篇幅討論了向氏參加西北考察活動的名義，並指出，北京大學顯然係參加單位，「而整個印發材料中沒有『北京大學』字樣」。^⑤孟彥弘在替向達作傳時引用了向達〈自傳〉：

一九四一年那時候的中央研究院組織了西北史地考查〔察〕團，在額濟納河和敦煌一帶進行考古工作，要我參加。……我自己從重慶經蘭州到敦煌。一九四二年夏回李莊，一九四三年春又同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從四川出發，再到敦煌巡行發掘工作，當年冬我一人先回四川。

同樣以不少的文字來討論史語所與北京大學之間的關係，並有一些推測：「北大作為合作單位之一列入。『這也算北大的科學工作吧』，點出了此次考察北大作為單位之介入，實在是借了些向達的光吧」。^⑥

向達本人略有含混的說法，顯然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如「要我參加」之類的表述。實際上，以上諸人討論僅截取向達考察活動的某一階段的名義或活動，並非向達當時的全面相。

③ 閻文儒、閻萬鈞，〈向達先生小傳〉，閻文儒、陳玉龍編，《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頁813。

④ 張廣達，〈向達先生文史研究的貢獻〉，《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收入《張廣達文集·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197。

⑤ 參見榮新江，〈驚沙撼大漠——向達的敦煌考察及其學術意義〉，《敦煌吐魯番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第七卷，頁104-105；後收入榮新江編，《向達先生敦煌遺墨》（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0-13。

⑥ 參見孟彥弘，〈一位倔犟的歷史學家——向達別傳〉（未刊稿），頁11-13。

抗戰開始向達由法國經越南、香港輾轉返國，北平圖書館南遷，他失去原職，回到湖南老家。半年後，攜妻帶子前往廣西的浙江大學任教。^⑦其實，以向達的個人意願來說，他非常不願教書，曾告訴傅斯年，非要出來教書，以養家糊口，則只有去浙江大學。因為，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是向氏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老師，有師生之誼，當年也曾得到過竺氏的具體指導。^⑧向達不願教書和他並不擅長講課有關，他早年的學生鄧銳齡曾回憶向達：

他給人的最初的印象是約一位近五十歲的中年教授，身軀寬大結實，穿著臃腫的薄棉襖，面容黧黑，五官大而端正，戴著近視鏡，一頭黑髮。他先走下講臺親手發給我們油印的講義，全是文言文，字體端秀，應是他手刻的。然後神態凝重、聲音低沉，低頭看著講稿開講，偶爾在黑板上寫些難字或英文，又轉身低頭續講，不看聽眾，直到下課。^⑨

多年後的學生也說向達「平日說話行事，了無情趣，講起課來也是乾乾巴巴」。^⑩傅斯年勸向達到北京大學任教，又以可得中英庚款委員會研究補助款相助，使向達有點動心。傅斯年由昆明回到成都後，隨即著手向北大校長蔣夢麟（號孟鄰）推薦向達，又找中英庚款委員會負責人杭立武爭取補助名額。北京大學這時也有意要恢復「文科研究所」並設專任導師。文科研究所戰前由胡適主持，這時的胡適，遠在美國，任駐美大使，擬由傅斯年任所長，所以傳出面延攬人才。經與蔣夢麟、姚從吾（史學系主任）、湯用彤（文學院院長）等人商量之後，傅斯年正式寫信邀請其加盟北大文科研究所，其辦法如下：

- 一、專任導師（教授皆兼任導師），不教書。
- 二、以自作研究為主體，並指導與先生治學有關之研究生（人數必極少，全所有給之研究生僅十人，其屬於先生範圍者決不多）。專任導師等於教授，其待遇則薄者，因不如此，在學校行不通也。
- 三、月薪二百元（目下五十元外，七折實數為一百五十）。故如此一事業得到外間補助，可不折。此等事，尊意必不計校〔較〕，然弟承人之囑，當以聞也。
- 四、不兼他職。此在先生亦無問題。

^⑦ 《史語所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李 25-1-3。

^⑧ 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東南大學期間，隨竺可楨專門學習地理和氣象的數十人中，就有向達。參見胡煥庸，〈竺可楨先生——我國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編輯小組編，《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2），頁 3-4。

^⑨ 鄧銳齡，〈憶向覺明師〉，沙知編，《向達學記》，頁 163。

^⑩ 郝斌，《我要有個三長兩短》——記“牛棚”裡的向達，《萬象》2009.6：49。

傅斯年覺得這樣的安排，「此事與先生不教書之原則甚合，而此間書籍較多，或有其便利處」。¹¹並將此信另抄一副本，寄達竺可楨，不使向達有違約之困惑。不久，向達愉快地來到昆明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家眷安頓在昆明郊外的浪口村。

向達參與調查的名義，其實很早前就在籌劃之中，一九四一年初就被聘任為史語所的專任研究員。¹²向達在收到聘書後，致信傅斯年：

史語所聘書已於上月寄到，擬俟左右康復之後，再行報命。敦煌調查事，諸荷擘畫，感激無似。自惟來滇兩載，百無一成，而諸公曲予優容，不加譴責，每念及此，慚感交集。調查一事，自知學力不足，難期良果，唯冀以勤補拙，或可不至寶山空還。至於史語所之與北大研究所，氣息相通，有同一體，固可不分彼此。¹³

並表示供職何處，他本人並無成見。只是在向達被史語所聘請案中，北京大學並不痛快放人，多方挽留，致事有延宕。七、八月間又傳考察團可能在八、九月間起程，向達內心十分焦急，八月初馳書傅斯年陳明理由：

夏初曾上一函，想荷答及。六月間聞文儒抵渝，晉謁左右，來書道及尊況，深以為慰。……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合組西北考察團，定期八九月之間出發。七月初凌純聲先生來函，轉致濟之、彥堂兩先生盛意，屬達加入，當以為期過促，所餘時間不到一月，無論安頓眷屬，準備閱讀西北地志，以及自滇赴川，任何一事，俱難措置就緒，故只有復書辭謝，區區下忱，先生當能諒之也。¹⁴

事實上，考察團並沒有那麼快組成出發。向達猶豫在北大與史語所之間。年底時傅斯年請他儘快拿定主意：

看來此事必須作一段落，即先生自本月或下月份起，不作北大專任教授，即作敝所之專任研究員。敝所之決定請先生，早此一年已便決定，未知已收到聘書否？但職員錄上則已列入矣。（此文書處但據發聘記之也。）故駕來敝所，極其歡迎，但北大不肯放，其情真摯。好在所作是同一之事，即是到燉煌去，兩者似無所分別，乞先生就近商之于北大諸同仁，並乞示知至幸。¹⁵

史語所年初聘人，年底仍未獲當事人明確回應，傅斯年直接詢及：是否收到聘書？並按照文書處發聘的時間已將向達列入「職員名錄」，語氣委婉曲回，但透著一絲嚴厲。

¹¹ 〈傅斯年函向達〉（1940.4.20），《史語所檔案》李 14-28-1。

¹² 〈研究員聘書〉，由代理院長朱家驊具銜，訂約書期為民國三十年（1941）一月至十二月底止，薪水以國幣每月肆佰元按月致送。

¹³ 〈向達函傅斯年〉（1941.5.10），《史語所檔案》李 14-28-3；《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3。

¹⁴ 〈向達函傅斯年〉（1941.8.10），《史語所檔案》李 38-2-16；《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3-414。錄文筆者依原件校過，下同。

¹⁵ 〈傅斯年函向達〉（1941.11.8），《史語所檔案》李 14-28-2，《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4。

向達看到傳信後，即托天文所的李國鼎先生將聘書退回，代為面繳史語所。¹⁶
(圖二)

史語所原本打算要去西北考察的人很多，準備讓李濟任考察團長，吳金鼎、勞榘、夏鼐、徐旭生等人都在名單中，除向達外，李濟還想請一位專治佛教藝術的學者加盟，但未有合適人選。向達有聞黃君（可能是黃文弼）任團長的傳聞不確。籌劃中的經費應該支持兩年的考察活動。¹⁷傅斯年竟用李濟應在安陽考古工作之外，另有一大事，方可對得起此生，而西北考古亦屬此事等語相激，促李西行。¹⁸無奈李濟剛遭遇喪女之痛，心灰意冷，數月終夜無眠，以只求有所解脫，不必再舉輝煌為由，堅辭不就。¹⁹

向達兩次考察活動所用的名義及代表的單位並不相同。一九四二年考察團的名稱是「西北史地考察團」，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館籌備處及中國地理研究所三個單位組成。向達時為西南聯大教授，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聘請參加。²⁰當時由於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代理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史語所代理所長職務落到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頭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則由總幹事曾昭燏代行。所以向達給曾昭燏寫信彙報，並非出於私誼，而是著實的工作報告。等到一九四二年十月底向達到敦煌後，北京大學由校長具名向中央研究院申請合作，中研院復函同意，但在以後並未用到北大名義，只有第二次開始合作單位始有北大。一九四三年考察團的全稱為「西北科學考察團」，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四個單位共同組成。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派向達及閻文儒參加。²¹

二、並不順暢的開始

中央研究院的代理院長朱家驊是西北考察活動的第一推手，他積極鼓吹西北科學考察，主張大家都要去西北開闢科學的新天地。秉承朱的旨意，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主持了一個談話會，確定西北史地考察團的有關事項。有一份會議記錄記載了這次活動：²²

¹⁶ 〈向達函傅斯年〉（□.2.22），《史語所檔案》李 38-2-14。

¹⁷ 〈傅斯年函向達〉（□.11.8），《史語所檔案》李 14-28-2；《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4。

¹⁸ 〈傅斯年致李濟信〉，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 315。

¹⁹ 〈李濟致傅斯年信〉，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頁 314。

²⁰ 參見石璋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年表》（簡稱《考古年表》）（楊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2），頁 102。

²¹ 〈總辦事處來函〉（1942.11.6），後附抄北京大學來函及本院復函，《史語所檔案》李 38-1-9；石璋如，《考古年表》，頁 102。

²² 〈西北史地考察團談話會記錄〉（1942.04.08），《史語所檔案》李 38-1-5。

孟真先生侍石猷嚴發春伏惟

起居多福為祝為頌敦煌之行據濟之先生未教至今尚在討論之中近來局面甚繁此是不急之務自應從緩遲、未求不三怪也去歲承的赴史語所懷極之意感荷、特以閩海區邊形格勢禁遷延至今尚不知如何報

命言之增愧茲因天文研究所友人李國鼎先生赴滬之便懇具特研究院聘約代為函繳以為

原恕則幸甚、吳王庚庚會方面求

左右雅意代為乞荒數年未獲荒嶺崎嶇免凍餒保出

先生之賜唯自去秋以來此間生活文化太劇、緩急之間殊難應付與毅士先生及錫予老師商量結果七月以後至以新大領薪共七、九三月吳庚會協款八百四十元由泰三兄轉遞

昆明當以窘迫不堪一併借用此數在今年暑假前必設法歸還至於十月以後撥款之款李莊者已函泰三兄請其速予退回吳庚會吳雲書校注初稿未清年已寫得四分之三不久即可成事、難決時當將此稟交錫予老師並請其特呈

左右 教正藉崇文科研究所反吳庚會工作報告固如淺陋乞作不足以為

高明之目唯為求特教幸未工作告一段落、計過忘其工拙止、之忱不敢求

諒也謹此上

回不盡一、叩叩

逋安

後學 向達 敬拜

三月廿二日

圖二：〈向達致傅斯年信手稿〉，《向達先生敦煌遺墨》圖版。

時 間：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八日下午三時。

地 點：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

出席者：葉企孫、石璋如、勞榦、李承三、吳印禪（辛樹幟代）、王敬禮、劉次蕭。

會議討論三件事：考察團的名稱為「西北史地考察團；經費此次為二十一萬一千元，由中央博物院撥十一萬元，管理中央〔英〕庚董事會撥五萬元，中央研究院撥五萬一千元」。考察團分為兩組，歷史考古組有石璋如、勞榦、向達。地理及動植物組李承三、周廷儒、辛樹幟、吳印禪。歷史考古組中原本有高去尋，傅斯年覺得經費緊張，將其名字最終劃去。名譽團長是朱家驊，西北農學院院長辛樹幟任團長，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李承三為總幹事，總會計是王敬禮，會計是石璋如。中央博物院雖為發起單位之一，但並沒有派員，而是由向達代表參加。不過，在有關考察團所獲標本的分配

方案中決定，「任何標本只一份，應歸中央博物院；如有副本，則其副本得歸各團員之服務機關」。並規定所得一切古物均應歸中央博物院。研究報告，地理方面由中國地理研究所印行；動植物方面則歸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歷史、考古報告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或中央博物院印行。

困難時期的經費分配當然也是要討論的重點，每位團員的往返差旅費一萬元，共七萬。警工費五萬，運費二萬，設備費個人為單位者共一萬四千元，公用設備一萬二千元。工作經費，歷史考古組由於要進行考古調查發掘，三萬元；地理及動植物組只有一萬五千元。考察經費雖稱不上十分拮据，但遠遠算不上充裕，緊打緊算的經費預算，也埋下了向達與石璋如、勞榘之間不睦的伏筆。

會議確定四月二十日左右考察團出發，儘管時間非常倉促，仍由中央研究院具銜，向國民政府申報了「採掘古物聲請事項表」，詳細地填寫了率領人及團員的簡歷、調查範圍，在「計畫」項稱：

定為史前、邊塞、敦煌、地理四組，各組注意史前文化之探求；古代國防之設施；東西文化交流以及地理上自然現象。擬先以肅甘〔甘肅〕為中心，並考察寧夏、青海各處古代及現代之一切人文及自然現象，俟材料完畢，再求有系統之報告。²³

稱要調查現代之一切人文及自然現象，目的也是為引起國府的關注，以為調查具有現實的緊迫性。

中央研究院也有公函發往甘肅、寧夏、青海、四川、陝西等省政府及綏靖公署，請求對考察團所經地區及工作地點予以保護和便利。²⁴

雖然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準備之中，但史語所的主事者卻對考察一事憂心重重。會後，石璋如、勞榘將重慶方面的計畫，寫信報告給傅斯年、李濟。二人得知計畫之後，即致信葉企孫、辛樹幟，陳述了對此次考察活動的一些意見，主要討論經費問題：

接石、勞二君函，報告八日開會情形。知西北之行科目、人員均已加多，而經費並未大增，頗與濟前此在渝所聞者異。撰若如此分配，誠恐些些之款，只敷消耗於道路，而成績難期。史蹟一門，尤敢保毫無成就。蓋西北各地，原為物

²³ 〈本所函總辦事處〉（1942.3.21），「31 歷字第 0321.1 號」，附「採掘古物聲請事項表」原稿及抄本各一紙，《史語所檔案》李 38-1-3。

²⁴ 〈本所函總辦事處〉（1942.3.21），「31 歷字第 0321.2 號」文件底稿，《史語所檔案》李 38-1-4。

價高昂省分，而考古部門需款之大。據弟等既往經驗推之，即全數撥歸此門，已感不敷。若分散過多，將各部皆感拮据〔据〕，而成就皆鮮。故濟初定四人，年又主張去一人。且博物院之拾萬元（並非拾壹萬元），係遵理事會議決案，專供燉煌史蹟研究。若移作別用，即無法報銷。而以博物院撥款立場言，尤以搜集標本為重。故弟等之意，此拾萬元仍以全數劃歸史蹟考古為妥。各部門款項，必須劃分清楚，始能各工作計畫不相渾淆。至人員、科目之增減，似應視能否另加款項為標準。濟前此在渝所聞，生物、地理組本須於拾伍萬外，另籌經費。今混為一談，似非初議。抑更有進者，燉煌初步考查〔察〕，西人走之已熟，煌煌鉅帙，學人共喻。今茲之行，弟等感覺必須稍有所得。若漢簡及漢唐遺物，能有特殊發現，始免貽笑他人。若仍係試探性質，則西籍具在，展卷可當臥遊，何必捨吾人更重要之工作，空走此一趟哉？弟意如此，不知兄等以為然否？

此事再約言之如下：

- 一、如 兩兄有把握，費用在今年秋季能增加一倍，則 兩兄原計劃可實行。
- 二、如無上項把握，去之後轉成不了之局，史蹟工作，既不能作，又停止石、勞諸人在所之工作，甚屬不值。似應將此組取消，即令二君返所。如何之處，竚希 裁復。又會計、文書分工合作，在蘭州以東團體行動時，自屬甚好；至蘭州以西將分途調查，必須各司其事。若仍全體同行，恐彼此牽掣，皆有遷就，似頗不經濟。（圖三）²⁵

看到這裡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大體眉目，傅斯年、李濟對於西北史地考察團經費不足，深表擔憂。稍有點瞭解的人都知道，在整個人文學科中考古調查發掘，是最費錢的一門學科，它所動用的社會資源更像一個工程。經費不足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工作質量下降，該做的不能做。更重要的是考察團工作地點，「西人走之已熟，煌煌鉅帙，學人共喻」，西方著名的考古學家、漢學家、探險家斯坦因、伯希和、勒克珂、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能列出很長一串名字。史語所的學術目標是與西方學界爭取東方學的正宗，²⁶ 懸的尚高，僅經費一項即已落後他人，貽笑大方的結果，豈可避免？傅、李真正的擔心落在這裡。不能輸在起跑線上，是傅、李二人內心的強烈感受。僅隔一周，傅斯年又去信葉企孫：

²⁵ 〈傅斯年李濟函葉企孫辛樹幟〉（1942.4.15），《史語所檔案》李 38-1-6。

²⁶ 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上冊，頁 25-31。

古今
論衡

更有進者燉煌初步考查而人走之已熟燉煌之鉅帙昔人出喻今茲之行弟等感覺必
須稍有所得若璞崗及漢唐遺物能有特殊發現始免貽笑他人若仍像試探性廣
則西籍其在展卷可嘗卧遊何必捨吾人更重之工作空走此一躺哉弟意以此不知
兄等以為然否

此事再約言之如下

一、如兩兄弟把握費用在今年秋季能增加一倍則兩兄弟計劃可實行

二、如無上項把握去之後對國子之局史蹟工作既不能作又停止石渠諸人在所之工作

甚屬不值似應將此組取消即令二君迫可如何之廢妙希

裁後又會計及書分二合作在蘭州以東國侍行動時自屬甚好至蘭州以西時分途調查必項
各司其事若仍全伴同行恐彼此牽掣皆有遺憾似頗不經濟外附石渠二君團燉煌致

石渠信英附一 陶壽此致頌

道安

傅斯年
濟
同啟
四月十五日

圖三之 2：〈傅斯年李濟函葉企孫辛樹幟〉（1942.4.15）抄件

企孫
樹幟
兩乞

接石清二君密報在八日開會情形知西北三行科目人員均已加多兩位實並未大
增願與濟前此在渝所開者異撰若以此分配誠恐此之款以敷消耗於道路而或續難
期史蹟一內尤敢係甚無成就蓋西北各地原為物價高昂省定部內(而考士巨需款之火
據弟等既在臨推之即全數撥歸此內已感不敷若全數過多將各部皆感拮据而或
就皆辭散濟初定四人(弟)主張去一人(母博物院之拾萬元(並非拾壹萬元)係遵理事
會議決案專供燉煌史蹟研究若移作別用即無法報銷而以博物院撥款支場言尤以
搜集標本為重故弟等之意以拾萬元仍以全數劃歸史蹟考古為妥各部內款
項必須劃分清楚始能各作計劃不相碍濟至人員科目之增減似在現款內另加款項為
標準濟前此在渝所開生物地理組各項拾伍萬外另籌經費合混為一談似非初擬柳

圖三之一：〈傅斯年李濟函葉企孫辛樹幟〉(1942.4.15)抄件，《史語所檔案》李 38-1-6。